

第一辑

杂书杂事

张东荪编的一本书

——《唯物辩证法论战》

我平时在旧书摊上闲逛，看到各种各样的旧书和旧杂志，一般都很留意。有些东西，与自己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我要给相关的朋友收集起来。这个做法，说来还有一些源头。

有一年我去上海复旦大学，在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室参观，恰好周振鹤教授当时也在，那时他有一间房是专门放旧书的，我进去看了看，他收集的东西真不少。其它我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住当时周教授随意说的一句话：这些东西都是替国家收着的。这话很感动了我，让我在以后的时间里，处处想到它的意义。那时，我凡看到有关地理方面的东西，都要收起来，有几年，葛教授常来太原，我就都送给了他，我到上海去，没有什么好东西带，也都是送这一类旧书和旧杂志给朋友。我从不问这些东西对他们有什么用，我总感觉，会有用的，我常对朋友说，宝剑赠给英雄。这些东西我没有用，但朋友有用，为他们收起来，在我也是很大的快乐。

去年我和夏中义在一起编书，知道他对中国 50 年代的文艺思想有兴趣，特别是对前苏联文艺思想如何影响中国文艺思想，他有清理的愿望，以后我看到这方面的书，就都为他收集起来，很多东西你专门找还不一定找到，但就怕你平时留意。一旦有想法，在旧书摊上，有时好像是天意，你想要的书，它就真有。

有一段时间，我想收集 1949 年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

的旧英文字典，这个想法一产生，没有几天，我就有一次收集四本的战绩，在不到一年时间内，我居然收到了一十几本旧英文辞典，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居然都让我遇上了，加上朋友送我的几本，真是很有一点意思。还有关于 1957 年的“右派”言论集以及当时北大、清华出版的相关杂志，你只要有了想法，老天就帮忙，几年下来，这些东西已相当可观。我想写一本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用了三四年时间准备这方面的材料，最后盘点，不但大体收到了 50 年代的相关材料，就连延安整风时代的各种小册子，也见到了不少。不过在这些经历中，最有趣的还是关于张东荪编的一本书。

前几年，我看过一些张东荪的材料，也写过一两篇小文章。因为有过研究的念头，自然对他的东西就比较留意。张东荪的书，手边曾有过几本，后来都送了人。还是那次到上海，本来想见张汝伦教授，但错过了机会，我就托他的学生送了一本张东荪的《哲学 ABC》是世界书局出的。在张东荪的书中，我最想看的主要还不是他写的书，而是他编的书。我知道他在 30 年代初编过一本《唯物辩证法论战》，但这本书，一般的图书馆还不好找。真是天意，不久我就在旧书摊上见到了一本。摊主可能多少知道一点这本书的价值，只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索价二百元，我最后用一百元拿下。书是 1934 年北平民友书局发行的。

这本书，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重要价值，因为它是 30 年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一种世界性思潮的认识。这本书由张君劢作序，全书一册，分为两卷。左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书后的参考书目注明“上下”，似不够准确，让人误以为是两本书。张东荪在“弁言”中说：“本书虽名曰论战而实际仅登载反对一方面之论著。”因为当时“赞成唯物辩证法的书籍现在大有满坑满谷之势”。除了论文之外，书后还有一个附录，收了潘光旦主编《华年》杂志时，发过的三篇文章，分别为罗素《我何以不是共产主义者》、杜威《我所以不做共产主义者的理由》、柯亨《我所以不做

共产主义者的理由》。这三篇文章，今天读来，真让人感慨万端。书前有张东荪写的一则启事，表明了他编本书的一个尺度，他说：“文章必须从自由思想出发以批评态度来讨论。批评中有些赞成有些反对，自是不拘，惟有采宗教式的信奉态度，我们则未便登载，敬请原谅。”张东荪所担心的事，后来确实成了中国学术界的基本风格，后来中国学术的衰落，与此大有关系。

过去人们认为张东荪说过：“如有人要我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二者中选择其一，我就会觉得这无异于选择枪毙与绞刑。”这话其实不是张东荪说的，而是柯亨的话，翻译上也有不同。人们把这话看成是张东荪说的，是因为张把这段话写在了这本书的扉页上。看过这本书，真让人有一种“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之感。书前还有一则预告说，他要编一本《马克思派思想论战》：“本书乃《唯物辩证法论战》之扩大，包括各方面，如文艺（例如关于普罗文学）人类学（例如关于原始共产）社会学（例如关于阶级斗争）政治学（例如关于专政）经济学（例如关于价值论）历史观（例如关于唯物史观）以及考古学与东方学（例如关于中国社会史）。此外哲学伦理方面亦复列入，实际对于马克思派之思想全体作一重新估价，已约定专门学者多人撰稿，一俟稿齐，即付梓问世”。在许多关于张东荪的书中，这本书未见征引，不知道是没有出版，还是出版了一般不容易见到。如果出版了，我希望有一天能像巧遇前一本书那样，让我惊喜一下。

张东荪的一篇文章

——陈兼善著《进化论纲要》的序

张东荪是中国学术界一位重要人物，现在国内有几位专门研究他著作的人，听说澳大利亚还有一位学者，也是以他为研究对象的。张东荪这个人在 1949 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应该有他重要的地位，因为他的哲学思想在现代中国是发生过重要作用的。我平时看书，见到有关他的材料一般都要收起来，我自己没有能力研究，因为他的思想涉及哲学方面的知识太多。但我会把这些材料收起来送给相关的朋友，我是对张东荪这个人的经历有兴趣。张东荪在二三十年代非常活跃，写过很多东西。除了他自己的专门著作外，也常给朋友写序，而这些序言对于研究张东荪一生的思想也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些序言通常都是印在别人书里的，一般不容易见到。有一本陈兼善著的《进化论纲要》（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 年 6 月），书前就有张东荪的一篇序言，这位陈兼善，是张东荪早年的一位朋友。下面是序言的全文，没有标题：

达夫兄撰此书，嘱我作序。我虽对于进化论读过几部书，然究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从科学方面说，我自信不足以言此。不过从我与达夫兄的友谊上说，却不能不有一言。我自研究哲学以来，同时即注意于进化学说，于达尔文以后之新主张，尤为注意。间尝深慨于中国出版界，绝少讨论进化学理的著作。七八年前达

夫兄有稿件投赠《时事新报·学灯》，我见而奇之。遂与订交。此后同办学于淞滨，达夫于教授外，始终不忘其学问上的趣味，见新书辄购买，与我有同癖。尝告我中国有《天演论》出版以来，竟没有第二部书出现，诚可谓学术界之大耻，故有编纂此书之志。我每闻自欧美归者言，欧美各国以浅显文字说明高深学理之通俗书籍，皆出于专门家老教授之手。因为以高深文字说明高深学理困难。而以浅易文字说明高深学理尤难，苟非于此道三折肱，断不能将高深学理化为浅易文字。达夫兄虽不足当专门学者之誉，然精研十年，以其所得转介绍于国人，必有裨益于我国之学术界。且进化思想之宜普遍的灌输，不特在知识饥荒的中国为然，即欧美亦似有此需要。近来新出此类以浅易文字来解说进化道理的书，诚不为少，以我所见，如夫 Osborn 人，如 Lull 教授，如 Thomson，如 Kerr 教授等，都有所述作，足见进化论的知识，确有普遍灌输的必要。至于中国，不仅一班人，不知进化论为何物，即号为学者的人，恐亦多隔膜。前科玄论战有牵涉到进化论的，竟说达尔文说若有摇动，则进化论即失败；甚至于说进化论若自身不在那里进化，何以成为进化论呢？此种议论，包含错误甚多。须知达尔文主义只是进化论中之一学说，绝对不能代表进化论全体。达尔文主义，可以动摇，可以修改，或竟可以全废，而进化论却是依然无损。进化论自身可以有进化，而达尔文主义却不能有进化。在学术界对于进化的概念，尚欠明了，又何况其它呢？所以达夫此书实有速编纂，速出版的必要了。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张东荪作序。

从写序的年代看出，这是 1926 年完成的，但陈兼善的书五六年以后才出版。不过此篇序言说明了张东荪早年对进化论的认识，这与他后来的思想变化是有内在联系的，他对于新生力量的相信，是他这一生中的关键，成败得失尽在其中。

储安平编的一本书

——《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

储安平 1949 年前出的几本书，我都收集到了，其中一本《英国与印度》，还是张新颖兄编辑《储安平文集》时看到，专门为我复印的。以后出版的两本小册子《新疆新面貌》、《玛纳斯河垦区》我也都有了，但他编的一本书《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新月书店 1931 年 11 月出版），我却一直没有见到，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图书馆借了新月书店出的《人权论集》，但不知什么原因，没有把储安平的这本书借来看看，所以心中一直有点遗憾。

收集旧书的人，一般自己都有固定的方向，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用什么书，可以去找他们。这看起来费事，但有时候比到图书馆反而省事。因为那些有旧书的人，如果能有朋友知道他们有什么书而找上门来，通常会很高兴借出，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在文学界，上海陈子善先生是一个专门收集新文学书的人，在这方面，只要你有什么问题，去问他一下，总会有一些收获。但在社会科学研究界，我一时还想不到，想不到国内哪一位，是专门以收集旧时社会科学著作作为自己主要兴趣的，所以有时候遇到这方面的困难，一时还真找不到什么人去请教。我希望以后能有人在这方面专门用力，因为那个时代左右两面的学者，出过太多的集子，收集起来有相当的规模，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是很有帮助的。我有时候在旧书摊上见到这类书，自己并不需要，但我要尽可

能想到朋友中有什么人是专门研究这方面问题的。有一年我在旧书摊上见到《大公报》社出版的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原书七大册，我见到的是六册，只缺一册。这套书虽然并不难见到，三联后来修订出版过，但这样的旧版，并不容易见到，因为除了专家有一点兴趣外，一般人是不会专门买一套这样的书来看的。那套书在那里放了很久，无人问津，要价也还可以接受，我就收下了。我只是随便翻翻，找自己感兴趣的材料看，然后就放在了一边。后来认识了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先生，知道他在用心研究《大公报》史，我就找机会把这六册书送了他。他本来有一套精装本，是他父亲留下来的，与我送给他的是同一套书，从使用的角度来说，意义并不很大，但对于王芝琛来说，意义却是不同，因为这样有沧桑感的书，放在自己家里，能使人产生如见故人之感。人生有时真是不可思议，像我在山西这样偏僻的地方，能看见王芸生的旧作，而有一天居然把这旧作送到了他家（王芝琛现住在他父亲生前留下的房子里），这样的事，想想都很有意味。再说到储安平编的这本《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于我也有同样的意义。

2001年夏天，我有一次在旧书摊上突然见到了这本书，当时很惊奇，但摊主索价五百元，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当时我对储安平的研究兴趣已不如从前，因为有了新的研究题目，看摊主这样要价，就放弃了。但我回到家里就有一些后悔，因为储安平的书我都有了，就差这一本，再说价钱我也可以和摊主商量。隔周再去，书已不见了，我只有长叹一声，感觉我与这本书没有缘分，也就不去多想了。谁想到一年之后，我又与这本书相见，摊主已不是那位，要价二百元，我出了一百元就拿回了家，要说书价也不便宜，但我看到这本书于我有特殊意义，也就不犹豫了。看来这本书还是应该到我手里，这也算是我收旧书的一点奇遇，好像冥冥之中有人在把与我研究相关的书送上门来，你想，这样一般图书馆不常见的书，转了许多时间，还是让我遇上了。

这本书是“九·一八”以后，中国知识界对日本问题的看法，有

左舜生、胡愈之、武育干、俞颂华、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樊仲云、陶希圣、王造时、陈启天、张东荪、萨孟武、张其昀、梁漱溟、高永晋和“贯彻周刊社”及“时事新报”的两篇社论。文章多数是从已发表的杂志上收集的，但也有几篇是新作，从中大体可以看出“九·一八”以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对于研究中日问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储安平编这本书的时候，只有 21 岁，今天 21 岁的人大概不会想到去编这样一本书，就是想到了，也不见得能编出来，就是编出来，一本有各种不同声音的书，又去哪里出版呢？

一本最终要送人的书

仔细想想，我在生活中真正有兴趣的东西，还就是书。对书的感情，不光是实用，有时真是有一些情感和审美上的冲动。我见了印制特别好的书，不管有没有用，都想留下。我喜欢旧书，1949年前出的书还有50年代初的书，感觉朴素，有文化气息。

我有一次在旧书摊上看到“古生物志”丛书中的三十几本书，有李四光、杨钟健、赵亚曾、计荣森、尹赞勋、田奇隼和葛利普等等，都是当年中国最好的地质学家的著作，书都是英文，只有简短的中文摘要，序言多是翁文灏所写。这些书的印刷之好，是我过去没有见过的，可能是那个时代最好的印刷了，因为是和外面合作的出版物，经费比较充裕，由实业部和国立北平地质研究院地学研究所印行。

我看过一些科技史方面的书，多少知道一点当年中国地学和古生物方面的研究情况，所以就把这些书收下了。摊主见我要这些书，还告诉我，说同样的书，还有几十本，我说我都要，他要我去他家里。我当时有事，答应过几天再去。过了几天，我再与那个摊主联系时，他说书已经让另一个人拿去了，我一时无语。那个要书的人，是一个专做旧书生意的，自己并不读书。他要我再从他手里买下，但价格涨了许多倍，我又不愿意了。在我手里的这些书，我是看不了的，但我了解它是有价值的而且这类书只有到了专业人员手里才能发出光辉，我想把这些书送了人，但一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有一年，我

陪一个朋友去中国科学院采访席泽宗先生，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遇见刘钝先生 隔年我到香港 又见到了他 我想我们还是有缘分的 我已想好，找个机会把这些书送给他。如果当时能全收下这些书就更好了，这些书，我知道在专业的图书馆里并不难找，但让它们散在民间最后化为纸浆，我实在心疼，好在所费不是很多，就让它尽可能落到有用的人手里。

在这些书里，还夹了一本曾鼎乾的《中国地质文献目录》，副题是“西藏及金沙江以西区域之地质学及其有关科学参考文献目录”，1946年12月由当时的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印行，中英文都有，用纸精良，开本宽大，虽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书，但也让人爱不释手。作者在序言的一个注解中说，这本书共汇集了文献一千一百余条，其中西文八百种以上，包括六百个不同作者，看过图约四十种三百篇，这些书籍的三分之一，图的三分之二是中央地质调查所图书馆的馆藏。我翻了一下目录，虽然是外行，但也感到作者的功力，虽然是地质方面的专书，但有关西藏的各种史学著作和游记也都收在其中，我注意到了有陈寅恪的几篇论文，还有一本我见过的陈渠珍的《艸野尘梦》。我的朋友作家龙冬，曾有一年的西藏经历，他的太太也是西藏人，他非常推崇陈渠珍的这本书，我听他说过多次，还看过他为此写的一篇文章，那是因为沈从文和陈渠珍的关系。这本目录有一百多页，以我自己对中国学术史的了解，以后不大有人会再下这种笨功夫，所以恐怕还是这个专业里最好的工具书。我是一个喜欢书的人，但我知道书的最后命运，我还是要说，宝剑赠给英雄，这些书谁真正有用，我就乐于送给谁。

一份老北大的展览说明书

1948 年是国立北京大学的五十周年纪念，虽然时局已到了不可预测的程度，但好像这一切并没有太影响北大的纪念活动。当时纪念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在“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的总题目下，出版了大量的印刷品。北大最明白书比人长寿的道理。虽然时局已到了那样的境地，但为纪念北大的五十岁生日，教授们还是在努力记录下北大曾经有过的辉煌。在这些印刷物当中，最为人注意的当然是那册《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了。胡适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就在上面。这篇文章中最有名的话是胡适赞扬蒋梦麟的，胡适说蒋梦麟长北大以后，对胡适、刘树恺和周炳琳这三个院长（文学院、理学院和法商学院）说过：“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这样的话，是最负责的人，最有担当的人才敢说的。胡适在文章的最后很感慨地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的渡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渡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北大是不是渡过了最后的危机，只有历史知道了。

我曾见过一些北大五十周年纪念中的出版物，主要是中文和历史系教授的论文。这些东西，我初见时并没有特别在意，因为看到这些论文都收在了学者的文集中，许多过去也见过，就没有收起

来的念头。现在想来，还是有它的特殊意义，错过了，再想见到，很难。但有些东西，我还是留下了。有一册《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我见到时，没有犹豫就收起来，因为平时想了解一些学者的情况，非常有用，我一下见到过两册，一册送给了韩石山。《国立北京大学历届校友录》中收的是当时在北大工作的人，书编得很好，有校友索引，有校友当时的住处，你看北大教授的住处，就很有意思，在本校住的人并不多，这与后来大不相同。另外两册，一是关于敦煌研究的展览说明；还有一册是“法政经济纪录室概况”、“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说明”、“法律图书室藏书概况”。（1948年12月，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这三种说明性的材料在一起，薄薄一册，主要介绍的是图书情况。我现在想说的是《社会主义及苏联文献展览说明》。

我们看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要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看去，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北大的自由学风。当时在北大管事的人，多数是胡适他们那一班人，他们这些人，是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们不相信，不等于这些东西在学校里没有地位，更不等于这些东西不受重视。当时这种思潮于当局的关系也非常明显，这不待我们多说。但从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展览中的这份说明书，可以看出什么是北大真正的自由学风和什么是北大的兼容并包。一个大学如果没有一点胸怀，没有一点不计利害追求自由的勇气，是很难称得上是大学的。这份说明不算长，我抄在下面：

洎自民国五年蔡子民先生长校，以兼容并包之精神聘请各派著名学者来校，奠定学术自由研究自由之宏模，促成新文化运动之勃兴。一时众说争鸣风气大开，始成大学之所以为大。其时，陈独秀李大钊二先生首先介绍社会主义思想与新青年。其后李大钊先生主持本校图书馆，汇求社会主义文献甚力。旋招军阀之摧残，李先生竟

以身殉。本大学优良之传统横告灭绝者经年。民十八年冬，本校社会科学院设有社会主义之理想及其统系，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学。二十年，蒋梦麟校长返校，胡适，刘树杞，周炳琳三先生分长文理法学院，去旧布新，步入校史之复兴时期。本院遂请陈启修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研究，许德衍先生讲授社会制度研究（内容略分封建制度，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三部分），赵乃传先生讲授社会主义（内容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其它社会主义等），秦瓚先生讲授马克思学说研究，卢郁文先生讲授劳工运动及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文献之汇求遂为法政经济纪录室工作之一。抗战军兴，该室所在之红楼为敌寇宪兵队侵占，是项文献，胥告劫散。学校南迁之后，赵乃传先生继续讲授社会主义于西南联合大学。胜利复员以还，复得许德衍先生讲授社会制度，吴恩裕先生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樊弘先生讲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振汉先生讲授比较经济制度（内容分资本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制度），吴惟城先生讲授苏联政府。至于社会主义文献之采录，前由经济学系自总图书馆书库检出敌伪时期毁去目录卡片并加禁阅之劫余旧藏西文书籍，复自教育部平津区办事处收回伪新民会中央总会劫持并列为禁书之本校藏书，旋由方经恢复之法政经济纪录室于接收伪新民学院等敌伪机关图书资料中备加搜罗，为数遂大有可观。其中尤以伪新民学院劫掠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藏书中最众，其书目卡片具遭毁弃，书籍藏诸密室并加‘禁’字、‘伊’字或‘特’字戳记以事禁阅。年来积极从事极端繁重之整旧工作之结果，十年禁书卒得重见天日。同时，增新工作亦在极端困难之条件下积极进行。兹值五十周年校庆，特选出所存中文及日英俄法德诸国文字社会主义及前苏联文献之一部，都一千余册，以

供展览，并资庆祝。

1948 年的北京大学，能以如此方式纪念一种为当局所绝对排斥的思想，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当时大学的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不是一句空话，二是当时的思想自由也得到了有一定的保障。想到五十年前，北大在风雨中纪念自己的五十岁生日，还不忘记为一种异端的思潮专门设一个展览，什么是北大的过去？什么是北大的今天？不用多说，事情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读《美国手册》

柯柏年是中国早年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40年代末，由他出任主编，编辑了一本《美国手册》，1949年初版，1950年增订后再版，由当时的中外出版社出版。那时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已经确定下来，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他们还会要互相勾结在一起，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反对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粉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的任何一项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柯柏年从1947年开始编辑这本手册，用了一年时间编成。在50年代出版有关美国的小册子中，这本《美国手册》相对还有一些客观材料，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本手册已经限定了自己的评价逻辑，读者多少还会从这本手册中看到一点真实的美国，但我们从5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反美热情中，发现那些反映真实美国情况的书，已经很难发生作用，而且越是客观介绍美国的书，好像越没有人相信。

50年代初一些批判地介绍美国的小册子，其实还是可以看出美国社会制度的一些真相，不过人们不敢相信而已。《美国手册》中有一个问题是介绍美国宪法特点的，编者这样说：“美国宪法的主要特点是三权分立，又称钳制和均衡的制度（check and balances）。就是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机关各自分立，互相钳制；每一部门具有分别的权力和职务，不为其它部门所侵害但同时又得受